心黑的医院

□文／朱介人

如今的老百姓最怕的事是害病，一次感冒发烧，没有大半百元不敢进医院，更不要说害大病了。凡是看过病的人都说医院的心太黑了，但医院的心到底有多黑，请看《家庭医生报》的一则报道：上海某制药厂驻长春办事处在今年3月1日至3月28日期间，卖给一家医院的五官科、神经科、胸外科和呼吸科一种抗菌药共5364支，医院得到所谓的“促销费”就有37548元，平均每支7元。在这笔交易中，医院每天就有1341元的收入。这仅仅是一家药厂在一家医院的“促销费”，据长春市工商局稽查分局和长春市公安局侦察，从1998年初至今年5月初十几家药厂给长春各医院的药品“促销费”竟高达2000多万元。

所谓的“促销费”，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回扣”。医院进一次药，就可以凭空得到数万元的收入，医院怎么能不疯狂进药呢？而进了药后又必然给患者疯狂开药，抓住一次感冒头痛脑热的机会，硬是给你开大量的药。在这个过程中，发财的是药厂和医院，承担重负的是患病的老百姓。拦路抢劫，谁都知道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而对遭受危难的患者再无端地加上没有必要的药费负担，比拦路抢劫的性质更恶劣！但多年来人们都在默默地承受着这种宰割，谁让你要患病呢？其实，这是虚无的“倒霉论”遮挡了人们的眼睛，其实质是“健康卫士”对患者的愚弄和欺骗。人们是出于对“白衣天使”的信任才到医院去求助的，谁能想到“救命菩萨”会对患者敲诈和勒索！然而，活生生的事实是许多医生常常把没病说成有病，把小病说成大病，把大病说成危病，先是用先进的化验和并非必要的仪器检查诈取一笔，然后开一批昂贵的药品再诈取一笔，最后还要叮嘱你过一段时间来医院复查，准备再勒索你一次。此种作为，在“负责认真”的幌子下，暴露出的却是对金钱的贪婪，对病人的残忍！

为了榨取金钱，医院在药品价格上作了不少手脚。他们把普通药说成贵重药，把平价药说成高价药，从中牟取金钱。同时，他们把各种手术费不断地提高，连一次平常的包扎也动辄数十元地收取费用。难怪有人说，进了医院，除了不像宾馆那样收取服务“小费”之外，你就准备大把大把地花钱吧。对于这样的现象，价格部门也有一定的责任。许多年来，我们的价格部门在一般商品的管理上成绩是非常显著的，而对于药品这种特殊商品的管理却比较混乱，漏洞不少，医院似乎是个被遗忘的角落。医院有什么权力随便提高药价？各种手术费的价格你们是否检查过？如果每个部门都利用自己的职权之便随意变更价格，这不是乱套了么？

在这篇小文即将写成的时候，偶然在《中国中医药报》上看到一则令人欣喜的消息：以后“药品的价格就标在药盒上”。这个举措倒是治理在药价上做手脚的一剂良药。看来，医院的黑心再也“黑”不下去了。对所有老百姓来说，这无疑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

面对抉择

□文／赵德铭

凡看过《生死抉择》的人，都认为是迄今为止所看到的反腐影片制作得最深刻、最成功的一部。该片所选取的角度、挖掘的深度、打动人心的程度、辐射的力度等等，都让观众怦然心动！能把反腐败的影片拍到这个份上，确实是不容易的。这要归功于原作的作家张平。若没有这一部成功的小说在先，说没有这部震聋发聩的影片在后。

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观众，几乎都是在激动的状态中，看完这部影片的。记得伏契克在绞刑架下，曾讲过这样几句话：“人们，我是爱你们的，警惕啊！”这里的人们，显然是指那些善良的人们。也就是说，搞腐败的人，恐怕也不是一开始就腐败的，他们也有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影片中的郭中姚他们，在被提拔之前，恐怕也是尽职尽责的。只是由于后来官至若干品，大权独揽之后，逐渐得意忘形，放弃世界观的改造，一任私欲膨胀，这才朝着腐败深渊滑去，走向党和人民所不齿的对立面。此类人物当然丝毫不值得人去同情。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像李高成市长夫人江蔼珍这样原本善良贤惠的人，倒是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的。郭中姚之流，在廉洁奉公、坚持原则的市长李高成面前，可以说是无计可施了。但是，那些阴险的腐败分子，却早在他们的阴谋败露之前，就“未雨绸缪”了，郭中姚之流用线拴蚂蚱的办法，向原本善良但丧失警惕的市长夫人施压，迫使她酿造了一杯不得不由她本人饮下去的苦酒。令人悲哀的事实，不仅对江蔼珍本人是个沉痛的教训，而且对李高成也是个痛苦的抉择……

《生死抉择》这部影片，之所以如此打动人心，还在于它第一次在银幕上揭开了一个腐败集体的丑恶面目。它又一次向我们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反腐败斗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更深入、更复杂的层面，中国共产党能否战胜腐败、铲除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人民的生死存亡。严酷的斗争告诫我们，领导干部首先要自身坚持原则、坚决斗争固然重要，但领导干部的“内助”们也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别做给丈夫帮倒忙的蠢事啊！

千年之喜　王津萍　摄

崔永元谈“二五演”打擂

□文／京静

有着“冷面主持人”美誉的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前些时候应邀到冰城哈尔滨走了一圈，泛舟美丽的松花江镜泊湖上，良辰美景之下聊得兴起，崔永元“自动招供”道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小秘密：每年新历年初旧历年底，央视新闻评论部所属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东方时空》《新闻调查》几大栏目之间都要举行一次内部打擂，为了争当擂主，大家伙儿绞尽脑汁、各亮绝活，拿出来的作品甚至比正式播出的节目还要精彩几分。

崔永元透露说，因为内部打擂的时间定于每年2月5号且雷打不动，所以私下里大家把这场比武盛事又叫做“二五演”。每年打擂之前，各个栏目组都憋着一股劲儿，派出精兵强将制作自己的拿手节目，并且对外严格保密。到了“二五演”那一天，各栏目组一齐把底牌亮出来，那真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比如《东方时空》，就别出心裁将经典影片《粮食》改头换面，拐弯抹角地将制片人和几位王牌主持人编排了一番：新版本的《粮食》说的是80年后，当年的名主持和王牌记者都已作古，央视新闻评论部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时间在苦苦支撑，他最发愁的是片子，因为崔永元等人的后人——崔永元的儿子崔椭圆、方宏进的儿子方宏退、梁建增的儿子梁建少、李元元的儿子李三角等都拉杆子成立了制片公司，将好片子一股脑儿高价卖到国外，完全抢走了央视新闻评论部的饭碗。为了活下去，一大把年纪的时间颤微微地率领一群日本宪兵和伪军闯入制片村，像当年鬼子抢粮食一样翻箱倒柜搜罗片子，遍寻不着，就抓来崔永元的儿子崔椭圆问罪，崔随圆一看鬼子的刺刀两腿筛了糠：“太君，我实话实说，我实话实说！”他不说不要紧，一说鬼子和伪军更冒火：“你爹当年就没有一句实话。”段子演到这里，包括《实话实说》栏目制片人兼主持人崔永元自己都忍不住笑痛了肚子。善于针砭时弊的《焦点访谈》则使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戏——用针孔式摄像机之类尖端武器偷拍，偷拍的对象是各位主持人、编导、记者的家人子女，问出的问题全都直奔要害，受访者在毫无思想准备的前提下往往实话实说，播出时便成了无法抵赖的“罪证”。

崔永元说，每年“二五演”调演结束之后，出奇制胜的段子都被大家津津乐道好长时间。

九岁的余月要演“小格格”

广东巨星影业公司经过一年时间，在筛选超近千名候选之后小格格终于敲定，她是成都市大田坎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余月。9岁的余月在妈妈的陪同下来到广州，与巨星影业签下合约，成为巨星最小的艺员。乖巧活泼的余月在签约仪式上表现得落落大方，“星”味十足，在自我介绍时她居然把家里的住址，几街几号都如实告诉给记者，还大爆“干爹”邓建国，说他吃饭时喜欢把腿盘在凳子上，她稚趣的童言逗得几十位媒体记者捧腹大笑。

余月四岁开始学跳拉丁舞，5岁时在电视剧《一路风雨一世情》初次“触电”，6岁时又在电视剧《山那边哟好地方》中饰演女主角的女儿，戏份很重，之后又在《传染病区》、《重庆球迷》等剧中扮演角色。她拍过的广告更多，6—8岁三年中她共拍了近二十部。

据《格格要出嫁》的导演孙树培介绍，现在再拍格格戏，因为有了一个赵薇在前面，别人再拍也很难超过她，所以我们在这部戏里专门塑造了一个小格格，这样可以给观众一个新鲜感，这个小余月不但聪明漂亮，还挺有灵气，试镜时也丝毫不惧怕镜头，演好小格格，应该没问题。

（若冰）

于右任作诗误悼李根源

□文／钟爱琳

1963年下半年，寓居台湾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忽闻李根源在北京逝世，且来者言词凿凿，信誓旦旦。闻之，于右任不由悲从中来，涕泪唏嘘。

李根源是于右任的挚友，长达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俩结下了浓厚的友情。1905年，他俩一起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1920年前后，李根源任陕西省省长时，于右任正在陕西任靖国军总司令。1928年，李根源因反对军阀曹锟贿选，息影苏州穹窿小王山，并买山葬母。期间，于右任曾专程前往小王山探访李根源，留下诗文，并委托李根源在小王山购买墓地。当时，李根源还真的在小王山不远的玄墓山圣恩寺钟楼旁，为于右任购买了两亩墓地，并亲自在该墓地竖立“三原于氏”的界碑。1949年，于右任去了台湾，李根源应朱德邀请到北京养老，安排住在绒线胡同70号。为此，当时于右任闻得李根源逝世的消息后，心里自是难免伤悲，即作一首题为《五十二年口号》的七绝悼诗，以示对挚友的纪念。诗曰：“谭胡于李兔儿年，风起云场不共天。君等先行余有待，再挥血泪洗山川。”此诗第一句指谭延、胡汉民、李根源和于右任自己，他们是同属兔，生于1879年已卯年。这首七绝一经面世，很快地传到了时在北京的李根源面前。李根源一见，既感动又好笑，知于老这是以讹传讹、弄假成真了。于是，素来也喜吟诗作文的李根源即作《答于髯》七绝二首以和，回赠于右任，以正视听。其一云：偕君革命正英年，誓倒清廷不共天。辛亥功高终未竟，人民继起壮山川。

从这段戏剧性的误会中，人们可以看到于右任与李根源之间那种诚挚悠长的友情。

竞聘前夕

□文／赵青波

每每闻及机构改革、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这类新闻，作为中省驻地单位的我们总以为下岗距我们还是遥不可及的，尽管喊了多年的机构改革，也多是雷声大雨点小，一段时间过后就安然无事了，大伙依旧悠然而自得地工作着、生活着……

而这次机构改革“狼”真的来了，先是邻近地区的部分小银行因存、货款规模小，经营效益差而纷纷撤并，接着就是人员下岗分流。不几日，改革在我们单位也拉开了帷幕，因规模不够大、冗员较多、人浮于事，此次也必须压缩部分员工，减员是铁杠子、钢指标。可谁下岗谁上岗呢？手心手背都是肉。无奈之下，支行赶赴外地取经，最后一致认为，凭本事吃饭靠能力上岗，只有竞聘这一最佳方案了。

竞聘的消息一传出，单位的面貌就发生了显著变化，职工的仪表更端庄了，待客户的言语更亲切了，对工作的责任心更强了，先前需要在职工大会上点名批评的极个别劳动纪律松散的现象没有了，环境卫生也好多了，工作秩序更规范了……工作闲暇之际谝闲传者荡然无存，倒是到办公室打听报考经济（会计）专业技术职务的人陡然增多，关心学历教育的人多了，大伙以空前高涨的士气为“充电”而忙得不亦乐乎。

竞聘前夕的员工们为有备而战、心中有数，为使自己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败下阵来，皆养精蓄锐、蓄势待发。这不，往日家属院里篮球场上的龙腾虎跃者、羽毛球场上的飒爽英姿者、扑克牌前的围观吆喝者、乒乓球间你死我活的拼杀者们，如今都统统自觉地把自己关在书屋里，挑灯夜战苦熬通宵了。一时间，单位里平日无人要的业务知识读本、学习资料用书空前紧张，学习氛围格外浓厚。单位员工的家属们空前的意见一致、认识一致、团结一致、顾全大局，在这“危难之际、生死关头”纷纷牺牲自身利益，主动承担起了买菜烧饭、洗衣洗碗般的细碎活儿，不再为“平等”而斗争，不再为平日里家务分工不明而争执论理了、脸红脖子粗了……

竞聘即将开始，大伙都经历了一次思想的洗礼、观念的更新。都切身体会到了“行兴我荣、行衰我耻”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市场竞争的无情与我们息息相关，竞聘上岗是时代的要求，真才实学是市场的呼唤。再靠平平庸庸，不思进取、敷衍塞责，终究将被市场淘汰出局……

一百五十年前的一宗民告官上访案

□文／雷波

十九世纪中叶，合阳县，这块民风纯朴、文化积厚的土地上，“民有强毅果敢之质，而无骄情浮靡之习”。虽然自然条件差了一些，好在百姓们崇勤尚俭、所求不高，年复一年倒也安居乐业、相安无事。如果上天不故意和大家过不去，官府稍能体恤百姓那么一点点，乡亲们宁愿过这样的日子。

乡亲们的期望值按说不高，但要实现却不容易，因为天公以及他们的大老爷，都不是普通黎民们所能设定的。

道光二十七年（1847），春夏大旱，连续两季未降一滴细雨，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庄稼人的生计成了问题。市面上一斗麦子值银三两，价钱是正常年份的十几倍。乡民多以野菜、树叶果腹，道弃婴儿、相扶乞食者，遍见不鲜。

天灾不可怕，若能摊上这么一位“当官为民做主”的唐知县，再大的灾荒挨一挨，也就过去了。合阳的百姓们太倒霉了，沈知县可不是唐知县，他信服的信条是“当官不捞钱，死了白完完”。

面对大灾，知县沈寿曾不但不体恤民瘼，积极赈灾，反而加紧催缴当年赋粮。除此而外，前任知县陈煦任内的“出陈易新”仓麦，亦严督乡民们限期一并缴纳。知县沈寿曾的所作所为，无异于给大灾之年的百姓们雪上加霜，自然激起了民愤，乡民纷纷找知县沈寿曾理论，吁请缓缴赋粮、停缴仓麦。面对群情激愤的乡民们，理屈词穷的沈寿曾支吾其词，半天放不出一个响屁。回过头来，对这帮“刁民”恨得咬牙切齿。事后以乡民聚众叛乱上报，并动手到处缉拿出头的当事人，闹得全县上下鸡飞狗跳、居无宁日……。光在县西的王村，就缉拿了吕青魁等十五人，酷刑拷打之下，其中五人冤死于狱中；路井乡郭家坡村富户郭维元代催里粮，不知为什么，引起了沈知县的不快，沈寿曾借口郭私用朱笔填改了拘票姓名，犯了重罪，将其拘捕系狱。并强索贿银一千三百五十两，方许保释出狱。

知县沈寿曾的逆施倒行，令全县上下群情激愤。“道不平有人铲，事不公有人管”。家住县城槐里（康家后地巷）的康嵘，就是一位刚直不阿，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的生员。闻此，他当下联络受害者家属数人，直至臬司投状控告。不料臬、府、州、县上下作弊，以诬陷罪，将康嵘等人一并系狱。每日大刑威逼，迫使康嵘等就范。后经翰林王凤翔说情，始得出狱。经此折腾，康嵘一干人等已是身心疲惫，家资悉无。幸有义士大荔人段述之资助，康嵘他们才得以继续上京控诉。

在京城，碰壁无数，历经三载，终于将状告到了咸丰皇帝手里。咸丰元年（1851）十二月，咸丰皇帝按陕抚复奏御批：“合阳知县沈寿曾种种妄为，肆行无忌，着杖一百，从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大荔县令熊兆麟、同州知府李恩继、潼关厅同知凌树棠、潼商道万保、前任臬司严良训，一并交刑部分别议处；受害乡民酌予抚恤。”合阳人民深为康嵘的行为所感动，编写《康嵘告御状》一剧，盛演不衰，流传至今。

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里，百姓深受官宦欺压，自身权利毫无保障。遇有冤抑不平，无法忍受之时，才舍死上告，直至京城，往往这样的一场官司下来，几乎家破人亡，身心俱焚。象康嵘这样的成功者实属万中其一耳！

远眺太白七女峰　郭玉军　摄

不发财不亦快哉

□文／祖笙

“想钱想得发疯了”的人今天大有人在。仅在南方某省，据说现在就有了60万的精神病患者，而其间不乏为钱所困的男女。在物欲横流的年月里，一个人若能常想想不发达时的欢娱，于自己的修身养性来说，其实是有益无害的。

可曾想过，不发财也有着一大堆的好处；

可放胆涉足于情场，而不用担心伊人爱的非我人而乃我钱袋，不亦快哉！

不会有扒手像特务一样地跟踪我，即便扒手把贼爪伸进了我衣袋，扒走的也不过是一团草纸，不亦快哉！

睡梦中听到老鼠打架或其它异常声响可不予理睬，而不用披衣起床察看是否有贼人入室行窃，不亦快哉！

地震也好，海啸也罢，屁股一拍走人即是，不会因万贯家财毁一旦而哭天嚎地，不亦快哉！

任乱石穿云，惊涛拍岸，也断无被掀翻在地打成“资本家”或“地主”、“富农”的可能，不亦快哉！

没有被犯罪团伙绑票的可能，也不用胆战心惊拎了许多钞票去赎人，不亦快哉！

我可以借用别人的电话却没有电话可供人家白打，我可以理昭昭向别人借钱而别人却没道理向我要求资助，不亦快哉？

不会招致身边人的眼红和嫉妒，不会被人疑心我发的是昧良心的横财而有损我形象，不亦快哉！

为人处世可更多的时候跟着感觉走，而不会因一着不慎而被人骂作为富不仁，不亦快哉！

搞捐款活动时，本人只捐一元钱也被视为善举，富人放血500块却仍然被看作“小气”，不亦快哉！

旧时穷哥们见本人依然故我，不做敬而远之状，相知如初，暖一壶水酒就一碟小菜边月下推杯换盏，边共发英雄惜英雄之感慨，不亦快哉！

不会因伙食太好而“横向发展，而一趟趟跑健身房，而遍求减肥之良药，不亦快哉！

不会因有太安逸的环境而养成子女好吃懒做的臭德性，不亦快哉！

可故做清高，摆出视金钱如粪土的姿态，不亦快哉……

遥祭阿Q

——重读《阿Q正传》感言

□文／李金楼

阿Q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典型人物形象，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难得的一个典型。他是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的化身，在当时、现在甚至更为久远的将来，都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重要的教育意义。重读《阿Q正传》，对阿Q更多了一点认识，对鲁迅先生更加敬重。

勤劳的阿Q。他勤劳——“只给人们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以至有人能说“阿Q真能做”，却又极其可怜。阿Q在政治上无权、无势，没有基本的生活条件也没有起码的人格尊严，住在土谷祠，靠给人打工讨饭吃，连使用自己的姓氏也遭到限制，动不动就受到地保的勒索，只是人们取笑的对象。阿Q常遭赵太爷、钱秀才、假洋鬼子之类辱骂毒打，血汗被无情地榨取。没有人关心他的生存命运。“咸与维新”式的辛亥革命，也没能使他的境遇有丝毫改变。

麻木的阿Q：任人欺侮，但他始终弄不明白其中根源，更别说反抗了。他被赵太爷们逼得无饭可吃，以为是“小D”夺了自己的饭碗。他想“第一该杀的是小D赵太爷”。被赵太爷、假洋鬼子痛打，却拿和他一般恓惶的王朝出气。糊里糊涂做了替罪羊，被关押直到被杀，他也认为是自然应有之事。他想“革命”，得一点物质利益，而假洋鬼子却不准他“革命”。他把对假洋鬼子的仇恨迁转到“革命党”身上，认为“杀革命党的头好看”等。阿Q敌我不分，是非不明，世理不清，麻木愚昧。我们只能为他的“昏”而悲哀。

有着“癞疤疮”的阿Q：长在阿Q头上的是令人扫兴的“癞疮疤”，而他精神上更有令人憎恶的“癞疮疤”。其一，妄自尊大虚荣心。本来他已经够可怜了，他却认为自己了不起。“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他身体有缺陷，自己却觉得高贵至尊，忌讳人们说“光”“亮”，最后扩而广之连“灯”“烛”也忌讳。其二是祖传的转败为胜的“精神胜利法”。人家打了他，他想就算“儿子打老子”；人家称他“天下第一贱货”，他会把“贱货”二字轻轻去掉，欣欣然认为“状元不就是第一么”，“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在人家讥笑他的癞疮疤时，慑于人家的威力，反认为那“癞疮疤”是个难得的“稀罕物”，赌气自负地说“你还不配”。至于赵太爷，他想，那是自己的儿子，这样就觉得自己无比高尚了。其三，还有粗俗下流的毛病。如对小尼姑蛮顽粗鲁地调戏，想与吴妈谈恋爱，一开口就要和人家“困觉”。衰败社会无业流民的特点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欲反抗而不“敢”的阿Q：受到赵太爷的打骂，阿Q便觉得赵太爷是自己的仇人。长期积累的压迫，使他产生了这个认识。当革命风起时，他这样想，革命，使举人老爷如此畏惧害怕，真是痛快。“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了，太可恨！便是我也要参加革命党。”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他就气愤不过，“我总要告你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麻木愚昧可怜的阿Q终于下意识感到谁是自己对立的阶级，反抗、革命的萌芽也显露出来，只是这种萌芽太弱小，以至于人们难于看到，以至于它在屠刀下没有成长就毁灭了。阿Q想反抗却不“敢”，想革命却不“得”。影响得以后的一些人又不可避免的重复着阿Q的悲剧。

阿Q是一个典型，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寄寓了鲁迅先生对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对自己同胞劣根性的痛恨。阿Q是我们的前辈，是我们的父兄，我们的血液中有着他的遗传，我们一下子消灭不了他的劣根性，直到如今，我们依然可以从他身上照见自己的影子。为了扫掉这个影子，我们必须去自新，去变革，去奋斗，去努力。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各部室电话：要闻部：7344614 社会新闻部：7337708 维权部：7344649 副刊部：7344642 美编室：7344654 广告部：7321847 办公室 财务室：7340619 本报传真：7344613 照排室：7322446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刷